



特朗普 2.0 时代法律与权力的博弈

庞金友

【内容摘要】 特朗普 2.0 时代权力扩张与制度制约之间的博弈，构成了美国政治发展史上一次空前的压力测试。特朗普及其政治联盟通过激进化解释“单一行政官”理论、系统性运用行政命令、全方位推行政治化人事安排以及非常规构建“三权合一”的政治格局，试图重塑美国的权力结构，其本质是将法律工具化，从而为政治集权服务。然而，这一进程遭遇了多重制约：联邦司法系统通过宪法审查扮演了关键性“刹车”角色；联邦官僚体系以程序拖延、内部泄密和集体诉讼等形式实施软抵抗；公民团体与大众媒体则持续施加舆论监督压力。这场法律与权力的博弈凸显了美国宪制中法律形式主义与政治实用主义、宪法文本的刚性与权力实践的流动性、制度性权力与个人化权力之间的强大张力。没有任何制度设计能自动抵御决意突破它的政治力量。法治的存续不仅依赖于精巧的制衡架构，更取决于支撑该架构的政治文化、社会活力以及公民群体在危机时刻的守护。美国民主在这场博弈中正在经受严峻考验，其结果必将深刻影响其国内政治的生态与全球秩序的未来。

【关键词】 特朗普 2.0 时代 总统制 “单一行政官”理论 法政治学 权力制衡

【作者】 庞金友，中国政法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院长、教授。（北京 102249）

【基金项目】 中国政法大学“法政治学”交叉学科培育与建设计划项目

特朗普第二任期所开启的 2.0 时代标志着美国政治进入一个宪制规范遭遇系统性挑战的历史阶段。与以往总统权力在既定框架内的消长不同，特朗普 2.0 时代展现出一种旨在重构权力边界的激进态势。共和党同时掌控国会两院，保守派在最高法院占据稳固多数，为总统权力的集中运行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政治基础。在此背景下，诸如“行政令治国”“2025 计划”“单一行政官”理念的提出，解散教育部、解雇独立监察长、频繁签署行政令、宣布国家进入“紧急状态”、对全



球贸易伙伴征收“对等关税”等非常规举措的接连出台，已非简单的政策分歧，而是直指美国分权制衡的制度核心。随之而来的数十起法律诉讼与沸沸扬扬的宪制危机讨论，将一系列根本性问题推至前台：法律在面对决心突破边界的政治权力时，其约束力的效度究竟何在？既有的制衡机制依然有效，还是已然失灵？这场博弈将把美国民主引向何方？

对这些问题的探究，亟需一个能够穿透法律条文与政治表象的分析框架。传统法学研究往往侧重于对规范本身的解释，而政治学研究则擅长对权力的经验分析，但二者在解释当前危机时均显不足。因此，本文引入法政治学视角，旨在打破学科壁垒，将法律视为政治斗争的动态场域与战略工具，同时将政治置于法律规范的约束与塑造之下。这一视角要求人们同时审视：权力如何策略性地塑造和利用法律话语为其扩张正名；法律机构与规范又如何被动员起来抵抗、驯服或吸纳这种扩张；以及宏观的政治社会环境特别是极化的党派政治、汹涌的民粹主义与变迁的国际格局，如何深刻地影响上述互动过程。

既有学术积累为本文提供了坚实起点。从施莱辛格（Arthur M. Schlesinger）提出的宪法总统制已蜕变为“帝王式总统制”的经典论断，到围绕“后现代总统”的当代争论，学界对总统权力膨胀的形态与动因已有深入剖析。“单一行政官”理论的演进史，则为理解特朗普权力的法理包装提供了关键钥匙。关于司法审查的限度和国会制衡的衰弱，亦不乏精辟研究。然而，既有成果多聚焦于特朗普第一任期或更早时期，对特朗普 2.0 时代的新政治现实缺乏整合性、动态性的法政治学解读。本文旨在弥补这一空缺，通过深入的案例追踪与理论对话，揭示法律与权力在当代美国最激烈的碰撞中所呈现的复杂图景及其深远意涵。

特朗普 2.0 时代的权力扩张与秩序重塑

特朗普 2.0 时代的权力扩张，并非杂乱无章的权力攫取，而是一套以特定法理为基石、以行政资源为核心、旨在对美国治理体系进行系统性重塑的战略行动。其实质在于，将法律从一套约束权力的规范体系，悄然转化为服务于政治集权目标的战略工具。

这一权力重塑过程的理念内核，是“单一行政官”（the Unitary Executive Theory）理论的激进化与实践化。该理论源于对美国宪法第二条“行政权属于美利坚合众国总统”的宽泛解释，其核心是主张总统对行政部门拥有完全且不可分割的控制权。这使得美国行政权呈现出高度的单一性特征，即总统不仅有权解除行政分支内负责政策制定的官员，亦可直接指挥行使行政权的下属机构开展行动。由此，美国行政部门长期以来形成一种惯例：通过罢免、指令、废止等方式，将宪法第二条解释为赋予总统掌控法律执行的权力。^①特朗普团队将这一理论推向新的极端。他们不仅主张总统有权任免一切行政官员，更将政治忠诚度置于专业能力与制度角色之上，这直接体现在 2025 年年初对多名部门监察长的集体解雇上。这些被解雇的监察长，其法定职责本是独立监督政府内部的浪费、欺诈与滥权，但在激进的“单一行政官”逻辑下，他们则被视为“阻碍者”甚至“叛徒”，其制度角色被彻底漠视。更进一步，该理论被延伸用于侵蚀立法与司法边界，由此确立了一种权力认知，即“总统拥有宪法未明文规定的广泛‘固有’及‘依职权’权力，这些权力使其能够违抗国会的意志”。^②例如，在试图单方面解散教育部时，白宫所持理由竟是“总统应有权无条件支配行政权”，全然无视该机构由国会立法设立、其存废依法亦应由国会决定的宪制常识。这种解释实质上是将总统“忠实执行法律”的宪法职责，扭曲为一种判断甚至是否定法律效力的特权。

① Steven G. Calabresi and Christopher S. Yoo, *The Unitary Executive: Presidential Power from Washington to Bush*,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8, p.16.

② Charlie Savage, *Takeover: The Return of the Imperial Presidency and the Subversion of American Democracy*, London: Little, Brown and Company, 2007, p.14.



① 陈佳骏、李亚琦：《特朗普政府第二任期总统权力的扩张及其影响》，《美国研究》2025年第5期。

② Daryl J. Levinson and Richard H. Pildes, "Separation of Parties, Not Powers," *Harvard Law Review*, vol. 119, 2006, pp. 2311-2386.

③ Jon D. Michaels, *Constitutional Coup: Privatization's Threat to the American Republic*,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7, pp. 119-121.

在共和党统摄参众两院的特殊政治机遇下，“单一行政官”理念迅速转化为“三权合一”的体制重构。行政权内部通过“Schedule F”等计划，意图将大量专业文官职位政治任命化，旨在瓦解官僚体系的政治中立传统，将其改造为执政者的直接工具，“其目标是通过‘政府收缩’确保忠诚，打造能更‘轻松’执行极端政策的权力核心，进而实现扩权的本质目的”。^①府会关系则从相互制衡滑向一种“默许共谋”或“功能性瘫痪”：共和党控制的国会未能对总统的激进行政权进行有效监督，而在出现内部政策分歧时，极化的政治又使得国会难以形成任何实质性的制衡方案。^②司法系统虽保持形式独立，但通过连续任命，联邦司法机关的意识形态构成已发生显著右转，这至少在潜在意义上为总统权力创造了一个更为“友好”的裁判环境。

在此过程中，行政命令逐渐被“武器化”，成为推进议程、绕过国会的关键手段。2025年3月，特朗普援引《国防生产法》这一“战时权力”法案来推动关键矿产生产，便是典型一例。该法案的本意是在国家紧急状态下动员工业产能，但行政令将其用于一项长期的产业竞争战略，极大地扩展了“国家安全”和“紧急状态”的弹性边界，为总统经济权力的扩张开创了危险先例。另一项同日签署、旨在关闭教育部的行政令，则是对国会机构设立权的正面挑战，直接引发了数十名州总检察长的联合诉讼，凸显了府会之间在权力本源问题上的根本冲突。截至2026年1月15日，特朗普已签署229项行政令，远超以往任何一届总统同期水平（拜登首年签署77项，奥巴马首年签署40项）。这种“行政令治国”模式被批评为以总统意志替代立法审议，削弱了国会的立法主导权，形成事实上的单边治理。

尤为值得注意的是，特朗普2.0时代的权力运作呈现出显著的“私人化”与“民粹化”特征。权力的“私人化”体现在马斯克及其领导的“政府效率部”（DOGE）深度介入联邦行政，显然，其权力来源于个人财富与影响力，而非法定职位与民主问责，这严重冲击了基于专业官僚制的公共行政伦理。^③权力的“民粹化”则表现为特朗普持续通过社交媒体平台，绕过传统制度中介，直接向其核心选民进行情感动员与信息传递。其就职演说中关于“领土扩张”的惊人言论，更多的是服务于国内民粹情绪的象征性政治表演，而非严肃的战略规划。这两种趋势共同作用，使得权力进一步脱离制度性、程序性的约束，附着于个人意志与民粹情绪的直接授权之上。

法律与制度的反击：多重制约机制的回应与困境

面对特朗普2.0时代汹涌而来的权力集中化浪潮，美国宪制并非毫无作为。一系列正式与非正式的制约机制被激活，对权力集中化展开了一场艰难而复杂的阻击战。然而，每一种制约机制都在新的政治环境中暴露出自身的效能边界与内在困境，共同绘制了一幅制度韧性接受极限挑战的复杂图景。

首先，联邦司法系统在这场博弈中扮演了最为显眼且关键的“刹车”角色。遍布各地的联邦地区法官成为挑战行政令的前沿阵地，他们屡次签发临时禁令，暂停了从旅行禁令到解雇监察长等一系列争议性政策的实施。例如，在针对终止“出生公民权”的诉讼中，法官明确指出该行政令与宪法第十四修正案的明文规定及百年先例直接冲突。联邦最高法院在2026年2月以6比3裁定特朗普政府援引《国际紧急经济权力法》征收的全球关税“缺乏明确的法律授权”，因此属于非法。这些司法干预为抵挡权力扩张构建了坚实的堡垒，为制度反思、政治协商和社会动员赢

得了宝贵时间。然而，司法制约的“双刃剑”效应同样明显。其一，联邦法院在涉及战争权力、外交承认等高度政治性领域往往选择回避，使得特朗普一些极具挑衅性的外交言论（如“收回”巴拿马运河的声称）难以进入司法审查程序。^①其二，诉讼固有的滞后性与个案性，使其无法对权力的系统性扩张进行前瞻性、整体性的遏制。其三，也是最深刻的困境在于，司法权威最终依赖于政府的自愿服从。人们更担忧的是：如果联邦政府公然拒绝服从最高法院判决，又将如何？最高法院自身保守派占优的构成，也使其判决充满策略性权衡，可能在某些案件中既扩大总统权力又保留司法审查切口，形成复杂的“双刃剑”效应。

其次，相较于司法机构的活跃，掌握着立法权、财政权和监督权的国会，则在政治极化的重压下显得步履蹒跚、进退失据。由共和党控制的国会缺乏对总统进行强有力制衡的政治意愿，其传统的监督职能几近自我阉割。立法否决因无法凑齐推翻总统否决所需的三分之二多数而基本瘫痪。尽管国会的“钱袋权”理论上强大，但在党争面前，通过拒绝拨款来制约总统项目的努力往往难以凝聚共识。更具讽刺意味的是，当特朗普政府通过“政府效率部”试图冻结或取消国会已批准的支出合同时，虽然引发了国会对其侵犯自身拨款权的抗议，但这更多是制度性的、略显无力的尊严宣示，而非有效的反击。经过两次高度党派化的弹劾审判，这一宪法设计的终极制衡手段也已严重“去威慑化”，难以对总统形成实质性约束，即宪制本身正在逐步被特定政党或政治派系所主导，并依托其所掌握的制度工具实现自身利益的持续最大化。

再次，规模庞大的联邦官僚体系以一种更隐蔽却可能更持久的方式进行着“软性抵抗”。这支超过两百万人的职业文官队伍，并未被动地接受政治化改造。他们通过严格遵守烦琐的行政程序、要求可疑指令的书面确认、寻求内部法律顾问意见等方式，对激进政策进行程序性拖延与稀释。内部知情者持续向调查记者泄露信息，借助媒体舆论揭露政府内部的混乱与不当行为。联邦雇员工会则积极发起集体诉讼，就大规模裁员、非法解雇等议题寻求司法救济。此外，专业官僚在其技术领域内坚守专业标准，对明显不合理或不合法的政策提出专业性质疑，增加了政治领导层推行任意性政策的内部成本与风险。^②这种“软性抵抗”虽不似法院判决那般耀眼，却如同宪制肌体中的免疫系统，在微观层面持续地消耗着权力恣意扩张的动能。

最后，超越正式制度的民间社会与政治生态，构成了制约权力的广阔场域。声势浩大的社会运动，如“黑人的命也是命”，持续聚焦种族正义，形成了强大的道义压力。2025年4月和10月全美多地爆发大规模抗议，民众高举“不要国王”“维护宪法”“国会该干活了”等标语，表达对总统权力膨胀和国会不作为的强烈不满。尽管被冠以“假新闻”的污名，主流媒体的调查性报道依然在追踪权力滥用、揭露利益冲突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监督作用。智库与学术机构则通过严谨的政策与法律分析，持续质疑政府行动的合法性与有效性。甚至在共和党阵营内部，也存在微妙的张力：建制派议员在具体议题上，如全面退出北约的极端提议、税改导致的巨额财政赤字以及马斯克过度干预引发的行政混乱风险，与特朗普的核心议程存在分歧。这种党内异议虽不足以导致公开决裂，却能在一定程度上牵制最激进的议程，成为权力扩张路上不可回避的摩擦力。

法律与权力博弈的张力和议题

对于特朗普 2.0 时代法律与权力的激烈冲撞，若仅停留在具体事件与制度的描述层面，则难

① 亚历山大·M. 比克尔：《最小危险部门：政治法庭上的最高法院》，姚中秋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136—143页。

② Rosemary O'Leary, *The Ethics of Dissent: Managing Guerrilla Government*, Washington, DC: CQ Press, 2014, pp. 15-22.



以把握其深层次意涵。从法政治学的透视镜观察，这场博弈实质上是美国宪制内部几对长期共存、当下被激化至临界点的根本性张力的集中爆发。这些张力揭示了法律与政治在权力边界问题上永恒而复杂的辩证关系。

首先，法律与权力的博弈凸显的是法律形式主义与政治现实主义之间的深刻冲突。法律形式主义将法律体系视作一个自主、中立、以内部逻辑和程序正义为核心的规则王国，强调对文本的忠诚解释与对先例的严格遵循。联邦法院的判决、官僚体系的程序合规要求，均是这一传统的体现。与之形成尖锐对照的是特朗普 2.0 执政团队所奉行的极端政治现实主义（或称法律工具主义）。在其视域中，法律的首要价值在于其作为达成政治目标——无论是“美国优先”“让美国再次伟大”，还是巩固个人权力——的工具的效用。因此，法律被策略性地对待：合则用，不合则弃或曲解。解雇监察长时，其法定独立地位被忽略，只视其为需要清除的“障碍”；动用《国防生产法》时，“紧急状态”的法定要件被弹性处理，核心关切在于该法所能提供的权力杠杆。这场博弈的焦点，正是在于政治现实主义者的权力冲刺能否以及能在多大程度上冲破法律形式主义者所坚守的程序与规范防线。特朗普 2.0 时代的实践表明，当政治力量高度集中且意志坚决时，法律形式主义的城墙确实可能被打开缺口。

其次，法律与权力的博弈暴露了宪法文本的刚性与权力实践流动性之间的永恒矛盾。美国宪法是一部诞生于 18 世纪的简明文本，其对行政权的规定极具概括性。文本的刚性体现于其修改之艰难与其作为国家根本大法的至上权威。然而，政治权力的实践天生具有流动性、适应性与扩张性。从华盛顿到林肯，从罗斯福到小布什，历任强势总统都在实践中不断重新勘定权力的边界。特朗普 2.0 时代将这种流动性推至新的维度：通过理论诠释，将“行政权”膨胀为近乎无限的支配权；通过宣布“紧急状态”，将战时动员机制应用于平常的经济竞争。这迫使人们追问：美国宪制思想经过来自联邦最高法院的适度微调而成功进入了 21 世纪，既然这一基本机制已经通过了两个世纪之久的时间检验，为什么不会在第三个世纪继续呢？^①一部为农业共和国设计的古老宪章，其简洁的条文能否有效约束 21 世纪高度复杂化、媒体化与民粹化的超级总统权力？特朗普 2.0 时代提供的试探性答案是：只要辅之以足够的政治意志、有利的党派格局和激进的法律解释，文本的刚性可以被流动的实践持续拉伸，直到传统边界变得模糊乃至瓦解。

再者，法律与权力的博弈体现了制度性权力与个人化权力之间的紧张对抗。美国宪制设计的精髓在于制度性权力，即权力附着于特定的职位（如总统、议员、大法官），并通过精心设计的程序、规则与制衡关系来行使，以确保稳定性、可期性与公共性。然而，特朗普 2.0 时代彰显了个人化权力的强势崛起。特朗普本人的权力，在极大程度上植根于其个人的民粹魅力、操纵媒体的娴熟技能以及对特定选民群体情感的直接牵动。其政策常带有鲜明的个人烙印与表演性质，如关于“领土扩张”的惊人之语。更具象征意义的是马斯克以私人身份深度介入联邦行政，其权力源于财富、技术威望与个人影响力，完全绕过了民主问责与职位授权。这场对抗的核心在于，个人化的、诉诸直接民意的权力，能否被制度化的、基于程序与规则的权力所吸纳、驯服或约束。当总统以个人意志冲击文官制度，当科技巨头以效率之名架空公共机构，制度性权力的防御依赖于那些看似刻板的程序、漫长的诉讼以及深植于职业伦理中的规范。

最后，国内与国际层面的法律观呈现了国内法权威绝对化与国际规则相对虚化之间的分裂。特朗普 2.0 时代的“美国优先”哲学，在处理法律秩序范围问题上体现出一种分裂症候：在国内，它极力主张并扩张总统行政权的至上性，甚至不惜挑战国会立法的明确意图；在国际上，则以惊

① 布鲁斯·阿克曼：《美利坚共和国的衰落》，田雷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6 年，第 1 页。

人的速度退出各类国际条约与组织,将多边规则与国际合作视为可交易的“生意”或应摒弃的“枷锁”。这种交易式外交或霸权式外交的背后,是一种将国际法律秩序彻底工具化、虚无化的立场。从法政治学视角看,这反映了人们对法律共同体边界的根本性分歧:一种观点认为,具有实质约束力的法律秩序应以民族国家为边界,总统是国内法的最高执行者;^①另一种观点则主张,美国应深度嵌入并领导一个基于普遍规则的全球法律秩序。^②特朗普 2.0 时代旗帜鲜明地选择了前者,其结果是在强化内部行政集权的同时,从根本上动摇了美国所主导建立的战后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根基。

法律与权力博弈的后果和未来

特朗普 2.0 时代法律与权力的激烈博弈,其影响早已超越华盛顿的政治斗争,正在深刻塑造着美国的政治生态、社会心态与国际地位。这场仍在持续中的压力测试,既揭示了美国宪制的脆弱环节,也展现了其潜在的修复可能,并为政治学与法学理论提供了反思的契机。

就当下而言,这场博弈已在美国国内产生一系列深重的后果。政治极化与社会信任的瓦解进入恶性循环,公众对政府机构的信任度持续下跌,党派认同压倒了对宪制规范的共同忠诚。行政体系因政治化清洗、人才流失与内部监督机制的破坏而面临能力衰退的危机,“政府效率部”这类激进实验加剧了行政混乱与安全风险。尤为棘手的是作为“戴罪之身”的总统带来的宪制伦理困境,总统职务所享有的特殊法律保护与普通公民的法律处境形成刺眼对比,严重侵蚀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这一基石性信念。^③在国际层面,“美国优先”指导下的“交易式外交”与单边主义退群行为,极大地损耗了美国的联盟信誉与全球领导力,促使盟友加速战略自主,无形中助长了全球范围内的强权政治倾向。

放眼长远,这场博弈将对美国宪制产生何种塑造,仍是一个开放性课题。一种可能是,特朗普 2.0 时代所开创的某些权力实践模式——如行政令的极度泛化、对官僚中立传统的蔑视、对监督机制的压制——被后续者所效仿,从而将权力的基准线永久性地推向更集权的一侧,形成一种“新常态”。然而,博弈过程同样彰显了制度深处的韧性。司法系统在多数关键时刻一直坚守底线;官僚体系与公民团体的“软性抵抗”未曾停歇;联邦制下的州权成为抵制联邦过度干预的缓冲带;甚至党派政治本身也并非铁板一块。这些因素共同构成了纠偏与修复的潜在资源。美国政治史上固有的“钟摆效应”提示我们,权力的过度扩张往往为其自身的回调埋下伏笔。未来的调整可能通过选举更迭、最高法院的关键判决、危机引发的全民反思或是一场真正的宪制僵局后的妥协来实现。

从理论层面审视,特朗普 2.0 时代的案例提供了丰富的启示。它为总统制民主稳定性的经典学术争论提供了极具当代性的残酷注脚。胡安·林茨所警示的总统制的“合法性二元化”与“零和博弈”风险,^④在社会和意识形态极化的催化下,确有可能将冲突推向临界点。^⑤这一案例也再次雄辩地证实了法政治学的核心命题:法律绝非存在于政治真空中的自治体系;法律的效力与权威,从根本上取决于支撑它的政治力量对比、社会共识强度以及制度守护者的勇气。法治的维系,本质上是一场需要持续进行政治辩护与社会动员的永恒斗争。

在比较的视野下,特朗普 2.0 时代的乱象促使观察者进行更深层的思考。它以一种戏剧性的方式表明,任何政治体制,无论其历史多么辉煌、设计多么精巧,都可能因社会撕裂、精英失效

① 杰克·戈德史密斯、埃里克·波斯纳:《国际法的局限性》,龚宇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10年。

② G. John Ikenberry, *Liberal Leviathan: The Origins, Crisis, and Transformation of the American World Order*,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1, pp.60-65.

③ 布鲁斯·阿克曼:《美利坚共和国的衰落》,田雷译,第35—38页。

④ Juan J. Linz, “The Perils of Presidentialism,” *Journal of Democracy*, vol. 1, no. 1, 1990, pp.51-69.

⑤ 孟维瞻、张耀:《美国政治的去极化——知识精英的反思》,《世界政治研究》2024年第1期。



与民粹煽动而陷入治理危机与制度困顿。这一经验凸显了权力制约与监督机制的极端重要性，无论这些机制是正式的还是非正式的，是制度内的还是社会性的。它提醒所有复杂社会的治理者，维护制度的健康运行需要永恒的警惕、审慎的调适以及对核心民主原则与法治精神的共同坚守。对于持续探索自身发展道路的国家而言，深入剖析美国这场宪制博弈，有助于更全面、客观地认识西方制度的复杂性、内在张力及其调适限度，从而为构建更稳健、更有效的国家治理体系提供不可或缺的深层镜鉴。

结论

特朗普 2.0 时代法律与权力的博弈，已然成为刻画 21 世纪前半叶美国政治风貌的决定性事件。这并非一次普通的府会争执或政策分歧，而是一场围绕美国宪制根本规则展开的意义深远的较量。一方是手握“统一政府”资源、秉持激进“单一行政官”理论并娴熟运用民粹动员策略的总统及其联盟，意在系统性拓展甚至重塑总统权力的宪法边界；另一方则是由司法机构、官僚体系、公民团体以及宪制传统自身所构成的多层次且不甚协调的制约体系。

基于法政治学视角的分析揭示，这场博弈的实质是法律与政治之间永恒张力的极端化呈现。特朗普团队将法律工具化，将行政命令武器化，并利用政治机遇构建了一种“三权合一”的权力集中态势，对法律形式主义、宪法文本的刚性与制度性权力构成了严峻挑战。然而，制约的力量并未消失。司法系统以其专业权威扮演了关键的“刹车”角色；官僚体系以日常而坚韧的“软性抵抗”消耗着任性权力的动能；媒体与社会力量则守护着公共辩论的空间。这些抵抗行动证明了美国宪制中依然蕴含着深刻的韧性基因。

这场法律与权力的博弈告诫世人：没有任何一部宪法、任何一种分权制衡的设计能够自动运行，从而一劳永逸地抵御决心突破其约束的政治力量。^①制度的纸上蓝图与制度的实际生命力之间存在巨大鸿沟。法治的存续，最终并不取决于条文如何书写，而系于政治共同体成员对规则至上性的共同信仰，系于法官、官僚、议员、记者乃至普通公民在关键时刻守护宪法秩序的勇气与责任，系于一个健康、活跃、能够识别并抵制权力滥用的社会生态。

特朗普 2.0 时代尚未落幕，其最终的政治与法律遗产仍待书写。这场博弈可能以权力的部分回调与制度的艰难修复告终，也可能在美国政治中留下持久的疤痕，使总统职位获得永久性强势，而制衡机制进一步衰弱。最危险的可能性是开启一个宪法规范被持续侵蚀、政治斗争日益走向“赢家通吃”恶性循环的新阶段。无论结局如何，特朗普 2.0 时代已经以其特有的方式，为美国 and 世界上上了一堂关于民主、法治与权力本质的沉浸式公开课。它迫使人们重新思考那些曾被视作理所当然的问题：美式自由民主制度究竟有多坚固？当民主选举产生的权力决心反噬民主自身的框架时，谁以及什么能够捍卫民主？对这些问题的回答，将不仅直接决定美国的未来，也将在深远意义上形塑全球对良好政治秩序可能性的想象。

编辑 杜运泉

① Steven Levitsky and Daniel Ziblatt, *How Democracies Die*, New York: Crown, 2018, pp. 99-119.